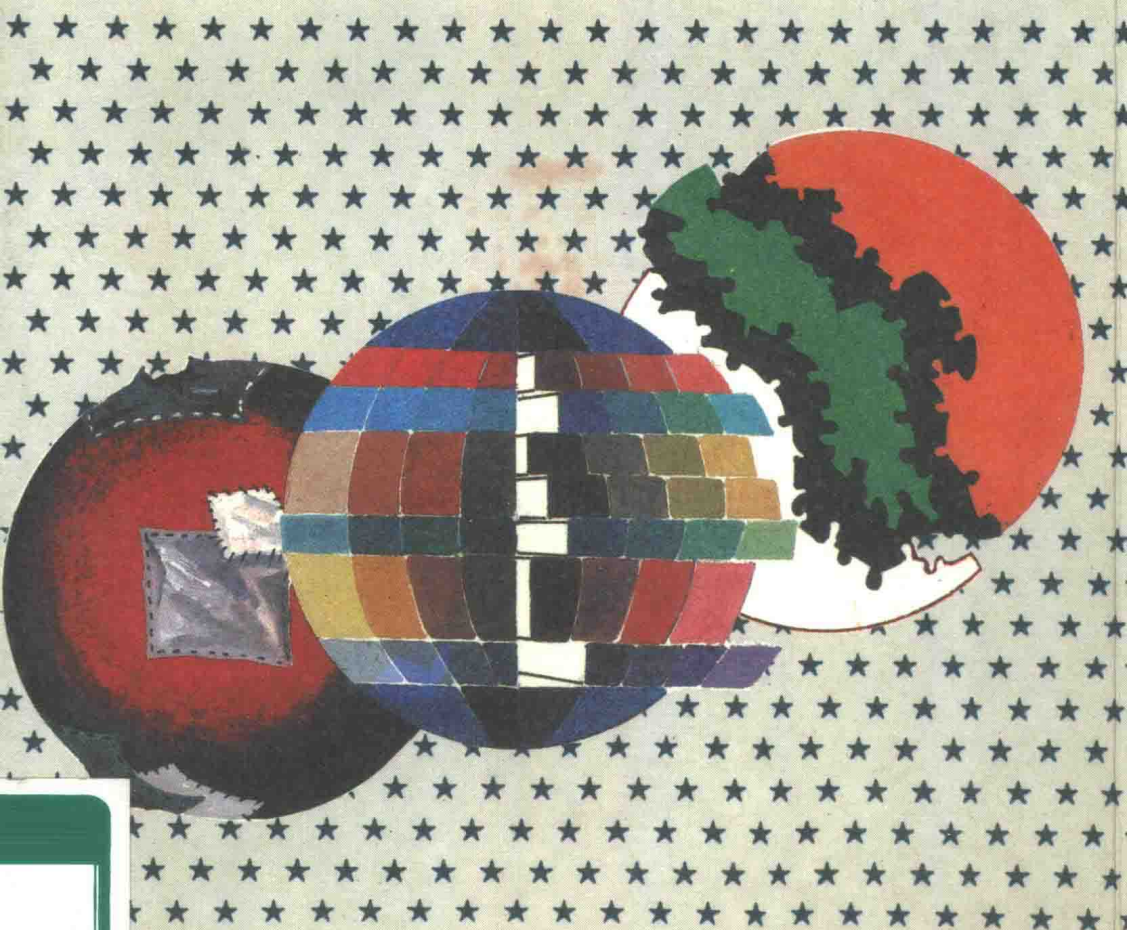


RICH COUNTRIES & POOR COUNTRIES

富国与穷国

W.W. 罗斯托著

王一谦 陈义 邱志峰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RICH COUNTRIES
& POOR COUNTRIES

富国与穷国

世界名著文库

第三卷 社会科学类



富 国 与 穷 国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美〕 W. W. 罗斯托 著
王一谦 陈 义 邱志峰 等译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Rich Countries and Poor Countries

Reflections on the Past, Lessons for the Future

W. W. Rostow

©本书根据美国 Westview Press, Inc. 1987 年版译出。
译本版权由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代为申请并已获准。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Copyright ©1987 by W. W. Rostow

Published in 1987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Westview Press, Inc.: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 5500 Central Avenue Boulder, Colorado 80301

富国与穷国

〔美〕W. W. 罗斯托 著

王一谦 陈 义 邱志峰 等译

责任编辑: 张家卉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9.8 千字

1990 年 2 月第一版 1990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7-301-00759-0/F·059

(平)定价: 3.75 元

献给埃尔斯佩思

本书与作者简介

在这十篇深邃而优美的论文中，罗斯托教授根据其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四十多年的研究和反思，论述了世界及其经济的未来。罗斯托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在一个可能趋于分裂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创造并保持文明而勤劳的国际社会。

众多强大的力量——包括一次以微电子、遗传工程、机器人、激光以及高技术向低工资地区传播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正不可避免地给世界各国带来许多形态各异的、盘根错节的问题。

罗斯托以其对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史的精深学识阐述了这些问题。除对这些问题的历史性和学术性论述外，本书中还有一些涉及墨西哥、印度、日本和环太平洋国家的单篇论文。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罗斯托探讨了影响超级大国的经济大趋势会如何使东西方紧张局势产生至关重要的缓和。对于任何关注世界经济未来的公民和学生来说，这部著作都将大有裨益。

W.W. 罗斯托是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他曾在牛津、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和其他许多大学执教，出版过《经济增长进程》、《经济增长阶段》和《世界经济：历史与展望》等二十六部专著。

中译本序言

《富国与穷国》一书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 W. W. 罗斯托论述当代国际经济的新著。在中国,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罗斯托的名字。他于 1916 年出生于美国的纽约市。青少年时期的罗斯托聪慧过人,年仅 15 岁进入耶鲁大学,1936 年在该校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在著名的牛津大学攻读硕士课程,1938 年获该校硕士学位。紧接着又回到耶鲁大学攻下博士课程,他年仅 23 岁已获得博士学位。

罗期托年轻时酷爱历史,后转攻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在其学术生涯中,罗斯托涉猎的范围相当广泛,但是,他总围绕一个重要问题——经济成长。在西方经济学界,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在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方面都独具特色。例如他提出的“起飞”、“成长阶段”等概念已为东西方学者所接受。在国际社会中,学者们广泛使用他提出的概念来分析各种经济问题。

在了解罗斯托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生涯时,他下面这些著作是颇为重要的:《经济增长过程》(1955 年)、《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1963 年)、《政治与增长阶段》(1971 年)、《这一切是怎样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1975)、《世界经济:历史与展望》(1978 年)、《为什么穷国变富了和富国减慢了速度:几篇关于马歇尔长期论的论文》(1980 年)、《富国与穷国》(1987 年)。

除了本书之外,罗斯托的下列著作已译成中文:《经济成长的阶段》、《从第七层楼上看世界》和《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由此可见,中国读者对罗斯托著作和学术观点是颇为熟悉的。

二

细读《富国与穷国》一书,人们会发现罗斯托知识渊博,学识根基深厚。在这本书中,他的笔锋所指,谈今论古,史理结合,纵横交错,对当代国际社会的重要经济问题和政治纷争均有阐述和说明。罗斯托分析问题运用历史主义分析手法,往往通过回顾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以及重要理论,由此引述他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剖析问题的根由,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阅读此书的人应具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并了解当代国际社会各种问题的形成过程。为了帮助人们以罗斯托的经济理论追根溯源,我们有必要指出,在《富国与穷国》的字里行间,隐藏着他的理论渊源: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凯恩斯经济学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等。我们在了解作者的理论渊源之后来阅读和利用本书资料就会措置裕如,而不致大相径庭。

三

在《富国与穷国》一书中,罗斯托对未来世界经济和政治前景的预言颇为引人注目。他说:“我认为,在下一世纪,世界经济和政治将面临巨大规模的调整。虽然工业发达国家(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口目前大约为十一亿,将近占世界人口的24%;但我断言,一些国家在下一个世纪将在技术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这些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56%,至少为二十六亿。而且在不久的将来,

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将比发达国家快。这将引起一场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本书第 23 页)。

他认为,在下一个世纪在技术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国家是位于南半球的拉丁美洲、北非、中东和发展中的亚洲国家。究其原因是一些地区的许多国家正准备迈向高科技领域。他惊呼这些地方正在悄悄地出现技术革命。在“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例已由 1960 年的 3% 上升到 1982 年的 10%;而在“较高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这一比例由 4% 上升到 14%。而这种比例正是日本六十年代经济起飞时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日本 1960 年同样的比例为 10%。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南半球一些发展中国家教育的重点偏向科学和工程学,有的国家的科学家、工程师的人数在近十年内成倍增加。

尽管发展中国家目前存在着人才流失的问题。但是,大多数科学家和工程师还是会留在发展中国家从事各种科学技术工作,因此,这些国家具有很大的吸收新技术的潜力。罗斯托指出,同发达国家一样,发展中国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这些不断增加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发挥出他们的技能,并且寻找使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和工人能有效而灵活地互相合作的途径(参阅本书第 80—81 页)。

罗斯托通观当代国际社会的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上述种种分析。罗斯托的上术阐述会引起我们思索:我们中国靠什么实现四个现代化?除了正确的政策指导外,科学技术是实现四化的关键手段。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在教育。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们的文化科学素质,培养大批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乃是治国之根本。

四

在《富国与穷国》一书中,罗斯托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提出了一些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然而,他并未能通幽洞微。他对当代国际社会经济问题的观察和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一隅之见,也有偏颇之处。《富国与穷国》中文版同中国读者见面之后,在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和思考的同时,也可能引起某些论争。不过,正如罗斯托本人所说:“我认为对于一系列新观念来说这种争论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十分赞赏这些争论”(见本书第2页)。我们翻译本书,并非全部赞成作者的观点,期望我国学术界、读书界同行本着开卷有益,论学创新精神研读本书。

为了使《富国和穷国》一书尽快与中国读者见面,本书是分工合作翻译的,其分工如下:陈义翻译第1、2章;邱志峰等翻译第3、4章;王一谦翻译本书第5、6、7、8、9、10章与作者简介前言;范家骧、孙亦丽、何田、梁小民分别审校了部分书稿,周安军、李敏校阅了部分章节。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加之时间仓促,翻译不当之处,竭诚欢迎读者不吝赐教。

罗 湘

1988年12月6日

前 言

这些文章都是 1983 至 1986 年期间脱稿或发表的，它们反映了我的一种特别的工作方式。在发展一组新观点的时候，我通常要参照对比一系列试验。我试图把崭露头角的一些新概念应用到某些特殊问题和情况上。

这些实践达到了几个目的。

第一，我弄清了这些新观念是否有生命力。如果它们不能有效阐释其内涵范围中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大可不必去探求这些观念。但即使应用试验一帆风顺，我也至少能够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它们也由此丰富了我目前从事的较重大研究的最终观点。

第二，在现代学术生活中不可避免地有许多业余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使用这类试验结果可以更加雄辩，避免使听众和自己感到索然无味。听众对于你所讲的是陈词滥调还是新颖而富有开拓性的成果一清二楚，况且这种讲话所引起的问题、讨论和命题探讨常常是获得信息的来源。

本书有以下特殊背景。到 1979 年 7 月我完成了关于世界经济史的四部著作，从而了结了我三十多年前的心愿。此后，我转而致力于反映我（和许多同辈人一样）为政府进行的多年研究的另一个课题——观念和行动的关系。我对六个专题进行了研究，并为每个专题写了一部小书。在其中最后一部书行将脱稿之际，我妻子为我们两人取得了出访一年的机会。在发出那部书的草稿之后，我们便

从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启程向西而行,这是因为我们的最后一项研究专题是亚洲地区性组织的过去和未来。在这次旅行访问期间我曾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十四个国家的官员以及两个主要国际机构的首脑谈话。这些会谈和沿途的其他见闻使我得以最后定稿。第八章反映了那部书的一些结论。

在海外的一年中我们访问了三十四个国家,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这些访问使我开始了对下一个主要课题的研究,这个课题从六十年代早期以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1960年《经济增长阶段》一书问世时它就引起了我的关注。尽管人们对这部著作众说纷纭,它仍不失为一部成功之作。发展中地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人从这部书中获得了大量启示。在日本和西方这部著作也风行一时。《经济增长阶段》一书今后将继续发挥影响,例如最近这部书在中国出版并得到广泛阅读。

不过,《阶段》一书激起了大量争论,但我认为对于一系列新观念来说这种争论没有什么不合适,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十分赞赏这些争论。然而,有些议论使我感到不安。显然,我未能使同行们注意到下面这个基本情况: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解释的,《阶段》一书植根于一种生产和价格动态理论,这一理论我在早期著作《经济增长进程》(1953,1960)中就曾加以阐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我说明不够,但至少一部分上可能是由于《阶段》一书问世时正逢其他两种经济增长分析方法刚刚兴起:在罗伯特·索洛、T. W. 斯万和詹姆斯·托宾的文章中提出来的滥觞于1955年和1956年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式;以及西门·库兹涅兹提出的滥觞于1956年的经济增长统计结构研究。(我的《经济日志》一文发表于1956年3月。)这两种高度综合的分析方法都未涉及对于一些特别领域的特殊技术吸收的意义重大的评论。后面的热烈然而有些模糊和结果不明朗的辩论的基础或许正是我对技术吸收进行评

论的不懈努力。

有鉴于此，在六十年代我下决心有朝一日要建立我的经济增长（而不仅仅是阶段）理论的最终模式，这一模式将更为生动有效地表现在各个领域采取具体措施应付发明革新进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其他被忽略的因素的需要。1983到1984年间，我将此决心付诸行动，对于沿途遇到的新技术表示了近乎痴迷的兴趣和关注——从檀香山到北京、从汉城到雅加达、从新德里到拉巴特、从维罗纳到乌普萨拉、从莫斯科到伦敦，以及沿途其他各站。1984年7月1日我回到家后，我便着手进行期待已久的研究。那一年晚些时候，我开始研究过去两个半世纪的经济增长理论史并在此背景上构造自己的理论。在写出大约一千页草稿之后，我感到这是一项大有裨益的学术事业。本书第一章提出了我现在设想这项研究最终将涉及的一些大主题，其他章节将详尽阐述这些主题。

本书的各章基本上都是这些主题的阐发。因此，即使在编辑之后也不可避免有一些重复之处。我认为应该接受这一事实，而不应损害对每种情况的论辩之辞。

这些章节中有五章以前发表过。我删去了其中一些集中讨论其对象国特殊情况的比较地方性的段落，但我都加了短序以说明情况。另一方面，我也没有按照一部书的传统章节形式改写这些论文。

W. W. 罗斯托

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	(1)
第二章 一九四五年以来的世界经济:传统的历史分析	(24)
第三章 富国与穷国问题: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一世纪	(60)
第四章 长周期与政策	(95)
第五章 世界经济展望	(127)
第六章 走向新的半球伙伴关系	(143)
第七章 印度和第四次工业革命	(158)
第八章 太平洋区域和世界经济	(178)
第九章 需要经济领导吗? 日本还是美国?	(195)
第十章 如何结束冷战	(207)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

对于经济系成绩优异的大学生们来说,《美国经济学家》不失为一本优秀杂志。我不得不承认,当我收到下文将提到的迈克尔·桑伯格总编的约稿信时,我还从未听说过这个刊物。这就是我最初的反应。我给妻子看了给我的约稿信和撰写同一系列文章的四位前辈的论文。她坚决认为我应该接受邀请,把这个系列继续下去。她的理由是:在18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理论构架方面,我确实兴趣盎然地写了许多介绍一些主要人物的文章,大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危,而在研究过程中,对我目前增长研究中首先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行思考,恰逢其时。于是,象往常一样,我接受了她的意见。

这篇关于森林问题的文章,是我怀着愉快的心情用一个周末写成的。它表明了,在1985—1986年深冬时节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问题。文章发表于《美国经济学家》的1986年秋季号。

一 复杂性、幽默感与创造性

桑伯格先生彬彬有礼地建议我写一写我的生活哲学。我很少受到这样的约稿,对于桑伯格先生的约稿,起先我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桑伯格先生想得周到,随函还附来四位前辈名家的这类系列文章。我发现这些文章很有启发性,实宜饕餮读者。但是,一想到要

* 转载自《美国经济学家》(1986年秋季号),第3—12页,有改动。

严肃地论述自己的生活哲学，我不由得想起马克·吐温、杜利(Dooley)先生、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等人的一些令人泄气的警言隽语。只有当我开始理解我本能地想拒绝稿约的双重原因时，我才觉得大概还可以一试。

首先是我注意到人类及其行为异常复杂，因而无法用生活哲学来驾御。大卫·休谟(David Hume)属于最聪慧之辈，他曾对此提出过值得铭记的看法：“你会认为，人类本质的这些原理是矛盾的：而什么是人这个问题本身就矛盾百出。”^①同样，詹姆斯·古尔德·科生(James Gould Cozzens)在其《魔鬼之爱》一书中写道：

人的气质或许可以定义为人的感觉方式或方法、其主要愿望的特定平衡、其所表现出的习惯倾向的总和。这些因素本身是不可理解的。这种因素通常实在太多了，它们常常表现出无法简化的复杂性。你只能观察结果……实际观察到的结果，就是生活方式的总和。^②

这种思路使我在写作有关我们自己的社会的著作时，一度把国民性概念作为我无法触及的概念抛到一边，而描述国民风格——即我们是如何处理问题的，因为前者超越了我所涉猎的范围。^③结果表明，明显不同而持续的行为模式尽管很复杂，但仍是可观察和理解的。

在大多数文化中，伟大的哲学家和神学家都力图从这种复杂性的某种脚本出发。例如，那两位伟大的科学家——诗人柏拉图和

弗洛伊德，就把人类这个系统简化为二个相似且相互作用的力量。

和型等，本我、自我和超自我。而说，他们都打穿

人的精神面

* 转载自《美国经济学家》(1986年秋季号)，第3—12页，有改动。

家则至今从来没能做到这一点。

正是对人的这种概念——用爱尔廷·莫里森(Elting Morison)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本性中令人惊诧的多样性和矛盾性”^④——导致了最优秀的政治家以幽默的方式去处理他们的事务,甚至在最严肃的事务中也不例外。对于他们自己及其同事,重要的一条是在行动之前必须考虑行动可能产生的许多后果。它使决策者记住,对手——走廊那头的或大洋那边的——也正在竭力对付因观点和压力冲突而相应地分成一个个集团的全体选民,并毫无偏见地表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大小与敌手能力之间的内在差异。

在肯尼迪总统图书馆,你可以从奥布里·门南(Aubrey Mennen)那儿买一只铭文的大咖啡杯,这段铭文是肯尼迪总统刻在一只大银啤酒杯上的,他把那只杯子作为送给他朋友戴维·波沃斯 1962 年 4 月生日的礼物。这段铭文是这样的:

现实中有三种事物,
上帝、人类愚行和笑声。
前两种超越了我们的理解,
所以我们必须做我们能做的第三种。

我认为,那至少是人类状况的部分真实写照。

第二个结论来源于下面这种看法。个人是不可能对其生活哲学作出最好的评价的。但是,再引用科生的话,在一段持续时期中,个人行为的“实际观察的结果”,可以近似地说明他实际遵循的生活哲学是什么。当然,这也许同他相当真诚地相信的生活哲学会有些不同。

这里的问题,较之力图解释我们的思想源泉(如阿尔弗雷德·